

· 万隆精神与“全球南方”合作 ·

从万隆会议到“全球南方”崛起： 国际发展知识范式转型探索*

徐秀丽 马俊乐

内容提要 纵观南南合作与国际发展体系这两个相互平行又交织的演进过程，由万隆会议开启的发展中国家追求发展自主性的诉求、联合自强推动南南合作实践演进、共同促进发展知识范式转型这条线索，尽管时有遮蔽，但从未中断，从而成为理解从万隆会议召开到“全球南方”群体性崛起 70 年历史的重要线索。“全球南方”作为南方国家发展主体性再度复兴的集中表现，背后有新发展资源、新发展经验和新发展平台的有力支撑，同时孕育着一种新型发展知识范式，这也是万隆会议精神的又一次升华。其中，中国是“全球南方”发展的重要引擎国家，在取得中国式现代化阶段性成就的同时，以中非共同现代化为关键着力点，协同其他金砖国家示范引领“全球南方”共同实现现代化，并且在实践层面塑造了“全球南方”发展知识范式转型探索中坚持发展优先、谋求多元统一、强调双向互动等若干特征。未来，中国需深入研究链接南南合作历史资源与“全球南方”时代内涵、处理好与西方发展知识范式关系，以及探索中国等新兴经济体引领“全球南方”发展的策略等问题。

关键词 万隆会议 “全球南方” 发展知识 南南合作 中非共同现代化

作者简介 徐秀丽，中国农业大学国际发展与全球农业学院院长、人文与发展学院教授；马俊乐，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博士后、山东社会科学院副研究员。

*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与一带一路国家有效分享减贫经验的模式与策略研究”(21&ZD180)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长期以来,在国际发展研究的英语文献中,南方国家、不发达国家或发展中国家^①等经常被塑造成被动的、需要被拯救和被发展的客体,但这一观念近年来随着南南合作的兴起正在发生变化。事实上,南方国家一直是发展实践和发展知识生产的关键主体,南南合作也一直与以北南合作为主体的国际发展平行并列,并推动全球发展格局的历史变迁。早在 1955 年 4 月,国际发展尚处于孵化阶段,联合国第一个“发展十年”尚未出台,而主导国际发展规范的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发展援助委员会(以下简称“经合组织发援会”)也尚未成立,29 个亚非国家和地区的代表在印度尼西亚召开万隆会议,首次在没有殖民国家参与下讨论民族独立、反帝反殖和经济文化合作等议题。万隆会议浓烈的政治诉求背后蕴含着广大亚非国家谋求独立自主、联合自强的努力,开启了南南合作的大序幕。70 年后的今天,“全球南方”与新型南南合作风起云涌,南方国家在物质经济总量、发展经验、合作平台等方面比以往更加丰富,结构性实力显著增强,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扮演着愈发重要的角色。

当前,学界大多从地缘政治冲突或大国博弈的视角来审视“全球南方”^②,对“全球南方”的战略重要性有普遍共识,但对“全球南方”的内涵、后续发展等议题仍存在较大争议。事实上,从国际发展视域看,联系 70 年前召开的万隆会议,当下“全球南方”的兴起体现了一种新型国际发展格局的隐现:其核心是南方国家作为一个整体较以往具备了更强的主体性生产能力和结构性能力,在自主现代化实践过程中逐步探索出适合自身特色的多元化发展路径,同时深化了彼此间的新型南南合作,孕育着一种新型发展知识范式^③,由此丰富了由北方发达国家主导的单一发展格局,为新时期全球发

① 发展中国家、第三世界、南方国家等概念具体内涵有所差异,但在本文中根据不同的语境交替使用,泛指除发达国家之外的其他国家。

② 参见周桂银:《全球南方崛起与当代国际秩序变革》,载《国际政治研究》2024 年第 1 期,第 83~113 页;赵可金:《百年变局中的“全球南方”》,载《人民论坛·学术前沿》2023 年第 12 期,第 5~12 页;吴志成:《“全球南方”的兴起与中国的立场担当》,载《学术前沿》2023 年第 12 期,第 13~20 页;徐秀军、沈陈:《“全球南方”崛起与世界格局演变》,载《国际问题研究》2023 年第 4 期,第 64~78 页;王健、任琳、吴洪英、刘中民、徐秀丽:《国际秩序变动中的“全球南方”与中国角色》,载《西亚非洲》2023 年第 6 期,第 3~33 页。

③ 参见李小云、徐进:《全球南方能否成为中国新的战略纵深?》,载《文化纵横》2023 年第 2 期,第 38~46 页;王健、任琳、吴洪英、刘中民、徐秀丽:《国际秩序变动中的“全球南方”与中国角色》,第 27~33 页;唐丽霞:《发展示范与资源提供:中国对“全球南方”的重要意义》,载《人民论坛·学术前沿》2023 年第 23 期,第 70~79 页;李小云、唐丽霞:《新发展主义:可否成为全球南方的理论武器?》,载《文化纵横》2024 年第 12 期,第 12~23 页。

展提供了新的可能性。因此，在万隆会议召开 70 周年的历史时刻，本文将从发展知识转型的视角来审视“全球南方”与南南合作，剖析“全球南方”与南南合作所承载的新发展知识范式的历史渊源、现实进路和未来走向。这将有助于继承万隆会议的历史遗产，为万隆精神赋予时代内涵，同时为理解和推动“全球南方”与新型南南合作提供新的维度。

一 南南合作与国际发展体系：平行又交织的线索

回顾历史，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建立起来的国际发展合作体系，基本上是按照北方国家的意志、围绕南北合作来构建和变革。国际发展合作在很大程度上就等同于南北合作，这体现在发展思想、发展理论、发展机制、发展平台、发展议程等多个方面。从发展思想层面看，主流叙事多从西方发展历史历程中去梳理，最早可溯源到古希腊亚里士多德等哲人的发展观^①，经过中世纪和近代历史进程，西方世界在关于自身社会如何在宗教改革、工业革命，以及实证主义思潮不断兴起的背景下、追求社会进步和维系政治秩序思考中，萌芽了现代发展思想，并经过殖民主义的海外扩张和二战后国际发展建制的设立，逐步成为人类社会看待世界演化和社会变迁的主流价值标准。^②从发展理论层面看，经济增长、现代化、新自由主义，乃至刻画东亚国家发展奇迹的“发展型国家”等一系列指导国际发展实践的主流理论^③，或是由北方的知名人士，或是在国际组织框架内提出的，而理论建构的经验来源主要参照了北方国家的发展模式，或是经过北方国家发展专家的理论建构。从发展机制层面看，一些学者认为，现代国际发展架构始于美国总统杜鲁门提出的“第四点计划”，该计划将欠发达与发展紧密联系起来，开启了北方国家系统援助南方国家发展的新治理机制，并催生了从联合国到经合组织发援会等双多边民间、全球、区域、国别多层次的发展援助规划。从发展平台层面看，当前国际发展合作治理框架内的主要发展机构，如联合国系统、世界银

① [瑞士] 吉尔贝·李斯特著：《发展史：从西方的起源到全球的信仰》，陆象淦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 年版，第 38 页。

② 徐秀丽、李小云：《发展知识：全球秩序形成与重塑中的隐形线索》，载《文化纵横》2020 年第 2 期，第 94 ~ 103 页。

③ [英国] 彼得·华莱士·普雷斯顿著：《发展理论导论》，李小云、齐顾波、徐秀丽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 年版。

行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经合组织发援会，以及众多国际非政府组织、基金会等，基本由北方国家发挥主导或引领作用。尽管从发展议程上看，不管是联合国层面的 4 个发展十年，还是千年发展目标和可持续发展议程，其中不乏南方国家的推动和贡献，但仍然主要是由发达国家所主导，这些都体现了北方国家在发展知识上的力量和霸权建制。与北方国家主导的国际发展合作长期并行的一条线索，是南方国家追求独立发展的声音和南南合作的实践，它此起彼伏地贯穿于国际发展体系始终，与南北合作一样历史悠久、形式多样。

（一）南南合作的正式开启：万隆会议召开

现代意义上的南南合作与南北合作一样发端于二战后，20 世纪 50 年代中国援建阿尔及利亚、朝鲜等也可视作南南合作的重要组成部分。从历史角度来看，南南合作分为 3 个阶段。其中，从 20 世纪 50 年代到 80 年代，南南合作注重政治团结，促进民族解放，推动反帝、反殖运动等。第二阶段是从 20 世纪 80 年代到 21 世纪初，此时的南南合作更加注重经济技术合作，促进区域融合，在全球化的大背景下，加速各自国民经济的发展。进入 21 世纪后，尤其是近十多年来，随着南方国家的经济实力攀升，南南合作进入第三阶段，即全面深入的战略政治经济合作阶段，呈现出新型、综合合作的面貌。万隆会议对于南南合作在国际层面上的开启意义尤其值得纪念。1955 年 4 月 18 ~ 24 日，由印度尼西亚、巴基斯坦、锡兰（今斯里兰卡）、印度和缅甸五国发起，共有包括中国在内的 29 个来自亚非地区的国家举行了万隆会议，就共同关心的经济合作、文化合作、人权和自决、附属地人民问题、促进世界和平和合作等相关议题开展了广泛磋商。这是亚非新兴民族国家首次在没有西方国家在场的情况下自主发起，并成功举办的大规模国际盛会，为南南合作奠定了坚实基础。万隆会议形成了《亚非会议最后公报》，基于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提出了“十项原则”。^①可以说，这些原则不仅对与会的亚非国家，对于世

^① “十项原则”的具体内容是：（1）尊重基本人权，尊重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2）尊重一切国家的主权和领土完整；（3）承认一切种族的平等，承认一切大小国家的平等；（4）不干预或干涉他国内政；（5）尊重每一国家按照联合国宪章单独地或集体地进行自卫的权利；（6）不使用集体防御的安排来为任何一个大国的特殊利益服务；（7）不以侵略行为或侵略威胁或使用武力来侵犯任何国家的领土完整或政治独立；（8）按照联合国宪章，通过如谈判、调停、仲裁或司法解决等和平方法以及有关方面自己选择的任何其他和平方法来解决一切国际争端；（9）促进相互的利益和合作；（10）尊重正义和国际义务。参见世界知识出版社编：《亚非会议文件选辑》，世界知识出版社，1995 年版，第 56 ~ 57 页。

界上其他国家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导意义。^①

万隆会议尽管时间不长，但对国际发展体系与南南合作的塑造产生了深远的历史影响。其一，会议公报首条就明确提出“认识到促进亚非区域的经济发展的迫切性”^②，彰显出亚非国家自身对发展主体性的认知，试图摆脱被北方国家建构出的被发展的客体地位，标志着广大亚非国家在发展领域集体诉求的开端。其二，万隆会议还提出“关于与会国之间的经济合作的建议，并不排除同这个区域以外的国家合作的适宜性和必要性”。虽然此表述背后有复杂的政治因素考量，但相比美国构建的由发达国家单方面援助欠发达国家的理念，更为包容且更有力量。其三，万隆会议提出的“十项原则”充分尊重各国发展的多元性，为后续的南南合作实践注入了活力和灵魂，也被联合国等机构的多项决议反复提及，这是万隆精神延续至今的根源所在。其四，万隆会议也促使越来越多的亚非拉国家走向团结和联合，并推动了发展中国家之间的经济技术合作和区域化进程。随后，1957年亚非人民团结大会有48个国家和地区参与，1961年不结盟运动成立，1964年七十七国集团成立、联合国贸易与发展组织成立等，并在当年及1966年分别成立了非洲和亚洲地区的开发银行，并直接促成了20世纪70年代的一系列围绕着新的国际经济秩序的宣言与行动，以及系列南北对话，推动了南方国家间联合自强的制度性建设，给以北方国家为主导的不平等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带来重大冲击。最具代表性的是在20世纪70年代，石油输出国组织成立，并第一次集体采取了足以严重影响北方经济的措施，在工业化国家中间刮起了一阵恐慌之风。^③其五，万隆会议提出的若干条款切实转化为国际发展合作的实际行动，如1956年世界银行成立了国际金融公司，1958年联合国设立了经济发展特别基金（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前身的一部分）等，促使国际发展机构更加聚焦发展中国家的的发展。1964年，联合国贸易与发展会议成立，并在此之后陆续开启了联合国层面4个发展十年的努力。由此可见，由北方国家所主导的国际发展组织与发展机制中也蕴含着南方国家的努力和影响。总而言之，万隆会议

^① 参见陆庭恩：《论万隆会议及其影响》，载《西亚非洲》2005年第3期，第10~14页；贺文萍：《“万隆精神”与新时代的亚非合作》，载《当代世界》2015年第5期，第11~14页；任晓：《万隆会议后的南南合作》，载《当代世界》2015年第5期，第61~63页。

^② 《亚非会议最后公报》，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条约数据库：<http://treaty.mfa.gov.cn/web/detail.jsp?objid=1531875990731>，2025-01-14。

^③ [瑞士] 吉尔贝·李斯特著：《发展史：从西方的起源到全球的信仰》，第207页。

开启了广大发展中国家独立自主讨论和解决自身重大问题的先例，推动了国际发展与南南合作体制机制的完善，加速了资本主义世界殖民体系的瓦解。同时，万隆会议也促进了亚非拉新兴民族国家发展民族经济，并且开展改变不合理国际经济秩序的斗争。这些都为后续“全球南方”的兴起以及新发展知识范式转型探索铺垫了坚实的思想资源和实践基础。

尽管如此，由于南北发展实力悬殊、在运作与管理全球发展事务上南方国家缺乏资源、横向联合缺乏经验与机制路径等多方面原因，尤其在源于自身独立经验之上的发展知识建构方面，万隆会议的影响力有其局限性。例如，有研究者认为，该会议提出了诸多“善良的愿望”，但要在“发展”领域里有所创新，就必须关注亚洲和非洲社会的具体实践，并把它们同“发展”所引发的变革进行比照，但与会者在此方面的独创性有待提升^①。

（二）传统南南合作：式微但未中断

在较长一段时间内，南南合作几乎被日益增长的南北合作规模所遮蔽。但不管是世界银行等多边合作为代表，还是以单个发达国家所主导的双边合作为代表，南北合作的实践不仅没有改变当时广大发展中国家的落后面貌，反而导致南北发展差距日益拉大，发展中国家在世界体系中的地位愈发边缘。为此，自 20 世纪六七十年代开始，大部分发展中国家在联合自强的同时，各自尝试探索适合自身发展的路径，从实践、理论、机制等多个层面不断发出新的声音，通过多种形式争取民族解放、国家独立，并促进不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南南合作。

在实践层面，以坦桑尼亚总统朱利叶斯·尼雷尔发起的改革运动最为典型。面对联合国第一个发展十年计划实施效果欠佳的情况，1967 年坦桑尼亚政府通过《阿鲁沙宣言》，实施乌贾玛运动、国有化等一系列举措，为其经济发展注入自力更生、独立发展、自主发展等理念。^② 尽管因改革急躁、过度依赖外援、能源价格骤涨等因素致使改革失败，但其深刻影响了众多发展中国家的政策走向。在理论层面，以拉丁美洲的劳尔·普雷维什、费尔南多·卡多索、恩佐·法莱图和非洲的萨米尔·阿明等学者为代表，提出的依附理论产生了世界性影响。该理论深刻地指出了发达国家和欠发达国家是一种剥削

^① [瑞士] 吉尔贝·李斯特著：《发展史：从西方的起源到全球的信仰》，第 127 ~ 128 页。

^② [坦桑尼亚] 朱利叶斯·尼雷尔著：《尼雷尔文选·第二卷：自由与社会主义（1965 ~ 1967）》，李琳、徐宜修、王磊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 年版。

和被剥削的依附关系，广大亚非拉发展中国家面临的发展问题不是一种天然状态，而是世界“中心—外围”不平等结构的产物，外围国家现代化需要摆脱对中心国家的依赖。^① 依附理论的提出打破了完全由北方国家构建的发展理论体系，为国际发展提供了新视角，也促进了亚非拉国家发展政策的变革。在机制层面，一系列南方国家区域性经济合作组织相继成立，包括东南亚国家联盟、加勒比共同体、西非经济共同体等。1978年，138个国家参加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召开的联合国技术合作和发展中国家（Technical Cooperation among Developing Countries）大会，通过了《布宜诺斯艾利斯行动计划》（BAPA），成为南南合作进程中的重要里程碑。自此，联合国成为推动南南合作的主要平台，并将推动发展中国家之间的经济技术合作作为南南合作的主要内容。1987年，不结盟运动还成立“南方委员会”，并于1990年发布《南方的挑战》报告，促成南方中心的建立，进一步提升南南合作的组织化水平。但需要指出的是，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苏联解体、冷战结束，新自由主义全球化浪潮席卷世界，国际发展体系持续被北方国家规范所主导。

（三）新型南南合作：融合中日渐凸显

进入21世纪以来，以中国、印度、巴西等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快速崛起，南南合作也走出了低谷，与南北合作交织在一起，日渐融入几乎所有有关发展的国际会议或议程之中。其一，联合国2000年和2015年通过的《千年发展目标》和《可持续发展议程》聚焦南南合作的基础性诉求，系统推进减贫等发展中国家的发展议题，强调发展援助和南南合作的重要性。其二，发达国家由于自身发展援助的缩水和对援助有效性的反思，也更加重视通过三方合作等机制引入南南合作。2008年第三届援助有效性高层论坛成果文件首次将南南合作列为技术合作的机制之一，直接促成2009年南南合作任务小组的建立。此后，南南合作成为历届援助（发展）有效性论坛的主要议题之一。2011年，经合组织发援会发表《欢迎国际发展合作的新伙伴关系》^②，明确提出“欢迎作为发展合作资源和专家的所有提供者所做的贡献”，并设立专门部门开展三方合作政策对话等工作，发起有效三方合作全球伙伴关系倡议。其三，南南合作的广度和深度都得到大幅度拓展，除了政治合作，

^① [瑞士] 吉尔贝·李斯特著：《发展史：从西方的起源到全球的信仰》，第158~178页。

^② 参见经合组织发展援助委员会（OECD-DAC）网站：<https://www.oecd.org/en/about/committees/development-assistance-committee.html>，2024-12-14。

南方国家间投资、贸易、技术转移等往来日益密切。尤其是新兴经济体在发展过程中所形成的独特的发展道路和发展经验为发展中国家提供了选择和启示，重塑着国际发展合作体系。

近年来，新冠肺炎疫情、乌克兰危机、新一轮巴以冲突等全球和地区性挑战叠加，再次暴露出现有国际发展合作体系的局限性。相比之下，“全球南方”展现出以往发展中国家和第三世界国家从未有过的影响力，正在成为世界格局演变的关键角色。“全球南方”概念也因此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原本与现行国际发展合作体系交织在一起的南南合作再次凸显，两者间的差异也被放大。但如上文所述，南南合作与国际发展平行又交织的历史脉络始终没有中断，南方国家诉求自主发展的声音和南南合作联合自强的实践一直在持续，“全球南方”只是这一历史线索在当下的最新呈现。由此，有关各方进一步探讨“全球南方”与新型南南合作的兴起所带来的发展知识范式转型探索具有重要意义。

二 “全球南方”的崛起：国际发展知识范式转型探索

尽管万隆会议留下丰厚的历史遗产，但不得不承认，从 20 世纪 50 年代到 20 世纪 90 年代的冷战期间，南南合作的机制性建设和整体性影响力仍相对有限，南方国家在发展资源的供给、发展经验的分享，以及发展合作平台的全球对话等方面相对薄弱。近年来，随着“全球南方”国家的群体性崛起，这一状况正在发生根本性的转变。“全球南方”的新内涵主要体现了当前南方国家通过过去几十年的发展历程，秉承万隆精神的遗产，在实践中积累了更强的主体性生产能力，尤其是发展知识生产能力不断增强，这不仅体现在其研究机构、学者或理论成果，更重要的是其背后所承载的新发展资源、新发展经验、新发展平台等不断累积，由此发挥出前所未有的全球影响力。

首先，新发展资源的快速增长构成“全球南方”参与国际发展治理的硬实力，为深化和拓展新型南南合作提供坚实物质基础。“全球南方”涵盖了广大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人口总量超过 60 亿^①，占全球总人口的比例

^① 参见世界实时统计数据网 (Worldmeter): <https://www.worldometers.info/world-population>, 2024-10-30。

达到七成多。近年来，“全球南方”在经济总量、国际贸易、科技发展、对外援助等方面的综合实力显著增强。在经济总量上，以金砖国家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蓬勃增长。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统计，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国内生产总值占全球总量的比重从1990年的36.9%升至2023年的58.8%^①。其中，扩员后的金砖国家国内生产总值占全球总量达到1/3以上，超过了七国集团（G7）^②，全球经济发展重心加速转移，“全球南方”成为拉动全球经济的重要力量。在国际贸易上，发达国家长期占据着主导地位，并且以发达国家间的贸易为主，但“全球南方”在全球贸易中所占份额有了大幅提升。据统计，2022年“全球南方”国家贸易总额创历史新高，超过13.3万亿美元，出口贸易占全球份额上升至42%左右^③。同时，南南贸易增速持续高于全球平均水平，其规模已经超过南北贸易规模。在科技发展上，“全球南方”整体进步显著，创新能力大幅提升，并且在若干领域达到世界领先水平，如印度的软件服务、中国的“5G”通信、高铁和新能源汽车技术、巴西的航空航天技术等，改变了发达国家对先进科学技术的绝对垄断。在对外援助上，南南合作融资规模不断上涨，尤其是以中国、印度、巴西、土耳其等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不断增加对外援助预算，创新对外援助体制机制，许多新兴经济体设立国际发展合作专属部委，为国际发展合作治理注入新动能。例如，2013年至2018年，中国对外援助金额达2702亿元人民币，其中，提供无偿援助1278亿元人民币^④，均创历史新高。

其次，新发展经验的积累是“全球南方”相较于历史上的南方力量取得的最显著进步，亦是新型发展知识范式得以孕育的根源。纵观国际发展体系的演变进程，长期主导的发展理念及路径基本参照欧美国家单一的现代化实践经验。即便是在南南合作早期，发展中国家虽然也强调各自国家文明和发

①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2024年世界经济展望》，<https://www.imf.org/zh/Publications/WEO/Issues/2024/04/16/world-economic-outlook-april-2024>，2024-04-30。

② IMF，“World Economic Outlook: A Rocky Recovery”，<https://www.imf.org/en/Publications/WEO/Issues/2023/04/11/world-economic-outlook-april-2023>，2015-01-17。

③ UNCTAD，“Economic Transformation and Progress Towards the SDGs through Trade”，<https://sdgpulse.unctad.org/trade-developing-economies>，2024-11-15。

④ 《新时代的中国国际发展合作》（白皮书），载中国政府网：https://www.gov.cn/zhengce/2021-01/10/content_5578617.htm，2024-11-16。

展的多样性，也多次尝试探索适合本国的发展路径，但影响力微弱，向发达国家学习发展经验仍是主流发展叙事。特别是在冷战结束后，发达国家以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结构调整计划为抓手，以民主化、市场化、私有化为核心，极大地主导了诸多发展中国家的发展路径。“全球南方”的兴起逐渐重塑了这一局面，新兴经济体不仅经济实力快速增强，更重要的是在发展过程中未盲目复制西方现代化的发展路径，而是在批判性吸收西方发展路径及自身前期发展探索基础上，形成了有特色的新发展经验，主体性发展意识和能力被激发出来，构成新发展知识的元素，具体体现如下：其一，新兴经济体的发展成就解构了二战以来发达国家建构的一系列发展叙事，发展不再局限于“发达—欠发达”二元结构，发展经验也不再是西方发达国家所独有，弱化了发展的结构性和政治性色彩，开拓了发展经验的多元性可能。其二，广大发展中国家历经 70 多年的发展探索，无论是学习西方，还是自主改革，普遍尚未根本性改变贫穷落后的发展面貌，发展的主体性意识、能力和信心备受冲击。而新兴经济体的新发展经验则为广大发展中国家提供了更多的发展方案选择，并使其重燃发展信心。与西方倡导的单一发展路径不同的是，“全球南方”累积的新发展经验更强调从本国资源禀赋、社会结构、政治经济制度等实际情况出发，注重发展主体能力的培育和多元路径的探索，寻求发展的最大公约数和共同元素。其三，新发展经验的积累也促进了新发展知识的生产。随着国际社会对新发展经验需求的提升，南南合作、三边合作的实践也愈发深入，围绕新发展经验的知识生产逐渐成为学界聚焦的热点。传统的西方发展研究机构越来越多地聚焦“全球南方”的新发展经验，南方国家也陆续成立新的发展研究机构。例如，中国先后设立国际发展知识中心、南南合作学院、全球南方智库网络等平台，加强与所有国家开展发展理论和发展实践的研究交流，促进了新发展知识的生产。

再次，新发展平台的培育壮大成为“全球南方”主动融入现行国际发展格局、重塑国际发展治理秩序的有力抓手，新南南合作得以一种更加组织化、制度化的形式在全球公共品供给中扮演愈发重要的角色。目前，相关的新发展平台大致有 3 种类型：一是以金砖国家机制及新开发银行为代表的核心协作平台。自 2006 年巴西、俄罗斯、印度和中国四国外长在联合国大会期间举行首次会晤，金砖国家合作机制日益成熟，在政治安全、经贸财金、人文交流“三轮驱动”框架内不断走深走实。“金砖+”呈现出强劲活力，经过两

次扩员，从4个成员国增加到目前的11个国家，覆盖了全球35%的面积和45%的人口，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50%，成为最重要的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团结合作的平台，为“全球南方”参与全球治理、提升国际话语权、争取发展空间提供了强有力的组织基础。新开发银行作为金砖国家开展金融合作的重要成果，累计投资金额达到350亿美元^①，在全球发展融资中的重要性也日渐上升。二是由主要的新兴大国倡导或参与创建的区域性、全球性发展倡议或平台机制，包括中国发起的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继而发起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和全球文明倡议三大倡议，并发起设立了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等新型金融机构，联合设立了中非合作论坛、中国—拉共体论坛、中国—太平洋岛国经济发展合作论坛等“1+N”机制，东盟发起的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以及印度连续举办的3届印度—非洲论坛峰会等。这些多元化的发展倡议、新型机构，以及平台机制体现了“全球南方”积极参与全球治理的责任担当，也为破解全球发展赤字、安全赤字、和平赤字提供了新方案，优化了全球公共品供给结构。三是依托传统国际发展合作平台创设的新机制，为“全球南方”争取更大的话语权。在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2010年和2015年份额或股权改革中，巴西、中国、印度、印尼、墨西哥和沙特阿拉伯等投票权明显提升，领导层中的“全球南方”人员也有所增加，极大地维护了发展中国家的利益。2023年，非盟加入二十国集团，为“全球南方”维护全球多边主义、推动全球治理秩序转型争取了更大空间。此外，中国还捐资设立了联合国和平与发展信托基金、中国—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信托基金、中国—联合国粮农组织南南合作信托基金等资金平台，为国际多边项目提供资金支持和经验支撑，也借助联合国的专业能力和渠道优势更好地参与全球发展治理。

“全球南方”国家的新发展资源、发展经验与发展平台等要素不断累积，逐渐对不平等的世界政治经济体系产生结构性的平衡力量，并不断推动传统发展知识范式的转型，具体体现在如下方面：其一，传统发展知识建立在根深蒂固的北南不平等的政治经济结构基础之上，由此产生了中心—边缘、支配—被支配、主体—客体等二元对立的关系想象之中，但以

^① 《凝聚“大金砖合力”，同筑现代化之路》，载新华网：<http://www.news.cn/world/20241025/eb0fb38f28404e13b76905c007758991/c.html>，2024-12-16。

“全球南方”为主体的新发展知识体系则更强调平行、平等主体之间的互相启发和多条发展路径平行共进，并在其中找到共通性和共同性。其二，传统发展知识在实践形态上倾向于通过北方国家向南方国家提供援助，进而通过监测评估等多种理性化手段，不断强化其单一的、“开药方”式的知识传导模式，而新发展知识则避开这种演绎式的知识生成方式，更加注重通过共商共建共享的合作实践不断探索归纳形成“不完美”却更适合当地的发展策略，实践中合作形态也往往将援助、贸易、投资等多种方式进行结合，提升协同效能。其三，从发展知识的内核上，传统发展知识强调形式逻辑和理性的力量，坚持普适性和一元性，而全球南方发展知识则更注重实践理性、本土文化和历史经验的力量，强调共同性和多元化。虽然难以断言当下“全球南方”的知识体系已成型并能从根本上挑战传统发展知识，但這些在实践中不断成长起来、混杂的发展知识要素却产生了越来越大的影响力。

三 中非携手现代化：新型国际发展知识范式的典型探索

南南合作已历经 70 多年，在全球发展治理中持续发挥作用，但其建制能力有限，尚未取得实质性突破，关键制约在于缺乏强有力的、能够发挥“火车头”作用的引擎国家或国家集体^①，进而带动全球发展知识体系的范式转型。反观当下之“全球南方”，较以往不仅有金砖国家的集体引领，还有中国发挥举足轻重的支撑作用。中国式现代化实践取得了历史性成就，且具有大国担当，愿意探索以推进中非共同现代化范例，切实推动“全球南方”共同繁荣和发展的路径。这从很大程度上改变了长期以来“南南合作”资源不足、能力有限、平台机制后劲不足等难题，也对西方发达国家主导的全球发展治理带来冲击和完善的机遇，从而开启了国际发展与南南合作新阶段。

新中国经过 70 多年的探索，走出了一条适合自身国情的现代化发展道路，其发展成果体现如下：其一，中国经济规模不断跃升。2010 年中国国内

^① Branislav Gosovic, “The resurgence of South – South Cooperation”, *Third World Quarterly*, Vol. 37, Issue 4, 2016, pp. 733 – 743.

生产总值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2023年占世界经济的比重约为17%；^①其二，经济结构多元，具备较强的发展韧性。中国以全球7%的可耕地保障了全球20%人口的粮食安全；中国工业门类齐全，200多种主要工业品产量全球最高，2023年货物进出口总额占国际市场的12.4%，2023年实际利用外资和对外直接投资规模都达到千亿美元以上，持续彰显超大市场规模优势；中国高度重视科技自主创新，在载人航天、超级计算机、量子信息、核电技术、大飞机制造、数字技术、新能源应用等领域不断突破。其三，中国民生发展和社会福利显著改善。2023年末，中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达到66.16%，中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70余年年均增长6%；人口预期寿命于2020年达到77.93岁，高于中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②；此外，2020年底中国消除了绝对贫困，提前十年完成联合国可持续发展议程首要目标，改革开放以来40余年间减贫人数占同期全球减贫人口的70%^③，为人类减贫作出了历史性贡献。尽管中国式现代化仍在不断完善中，但其成果与经验激励了其他发展中国家。其中，有关政党在发展中的引领性作用，政府、社会与市场在不同发展阶段中的协同关系，后发国家在保持独立自主与融入国际体系之间维持有效平衡等宏观领域，以及在具体的农业、减贫、基础设施、工业化等微观行业上都有多种新型经验、知识与技术，可供与其他发展中国家进行平行分享。^④

中国式现代化的新型实践为中国引领“全球南方”共同发展筑牢坚实基础。作为全球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在现代化建设的各个阶段，始终注重履行自身的大国责任，以多元形式持续深化和拓展南南合作，支持广大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建设。其中，中非合作的悠久历史和持续发展最令人瞩目。非洲作为全球发展中国家数量最多的区域，始终是国际发展合作与治理的焦点，也是中国开展南南合作最重要的伙伴。20世纪50年代万隆会议结束后，

① 《新中国75年经济社会发展成就系列报告之一》，载中国国家统计局网站：https://www.stats.gov.cn/sj/sjtd/202409/t20240909_1956313.html，2024-10-31。

② 《中华人民共和国2023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载中国国家统计局网站：https://www.stats.gov.cn/xxgk/sjfb/tjgb2020/202402/t20240229_1947923.html，2025-01-17。

③ 《人类减贫的中国实践》（白皮书），载中国政府网：https://www.gov.cn/xinwen/2021-04/06/content_5597952.htm，2024-12-20。

④ 徐秀丽、李小云：《平行经验分享：中国对非援助理论的探索性构建》，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20年第11期，第117~135页。

中国基于双方共同的历史境遇和发展目标，在自身发展较为困难的情况下，开始无条件地援助非洲，涉及农业发展、卫生医疗、基础设施等多个领域，有力支持了非洲国家新生政权巩固和民族经济发展。坦赞铁路就是最有力的例证，至今仍是中非援建的大型成套项目标志性案例之一，成为中非友谊的象征。20 世纪 70 年代末 80 年代初，伴随国内改革开放，中国提出了对非洲经济技术合作“平等互利、讲求实效、形式多样、共同发展”四项原则，开始从单向援助转向更大范围的双向经济合作，充实了中非合作内涵。步入 21 世纪，中非双方于 2000 年共创了中非合作论坛，以组织化、制度化的新机制为非洲发展持续注入新动能，探索互利共赢的实现路径和方式。在中非合作论坛框架下，从“八项举措”“十大合作计划”“八大行动”到“九项工程”“十大伙伴行动”，双方合作不断深化拓展，目前已涵盖农业、减贫、工业、卫生、教育、环境、安全、贸易、投资数字技术、基础设施、人文交流等诸多领域。据统计，2023 年中非贸易额达 2 821 亿美元，连续 15 年位居非洲第一大贸易伙伴，中国对非直接投资存量超 400 亿美元^①，在交通、能源、电力、住房、民生等领域实施了一批标志性工程和“小而美”项目，有力带动非洲当地经济社会发展。目前，中非合作已成为中国参与全球发展合作与治理的重要抓手。从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三大全球倡议到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非洲国家都是极为重要的角色。2024 年中非合作论坛峰会明确提出“中非携手推进现代化”，以中非“六个现代化”助力“全球南方”现代化，推动中非合作迈向更高水平，也为新时期“全球南方”合作指明了方向，即中国与其他“全球南方”国家要共同推动公正合理、开放共赢、人民至上、多元包容、生态友好、和平安全等“六个现代化”。

中国式现代化实践为“全球南方”国家现代化提供了新方案选择，中非共同现代化则为“全球南方”开展现代化合作开辟了新路径。当前，无论是中国式现代化，还是中非共同现代化，仍处于发展期和探索期。同时，国际局势的不稳定性和非洲发展的差异性，也让后续发展充满了不确定性。全球政治经济格局加速演进，大国竞争和地缘政治冲突日益加剧，中国崛起及“全球南方”潮流对北方国家的全球霸权地位构成了挑战，已遭其全

^① 《中非经贸合作取得丰硕成果》，载中国政府网：https://www.gov.cn/yaowen/shipin/202408/content_6969766.htm，2024-12-20。

方位遏制和打压，并被恶意分化和污名化。另外，非洲作为中非共同现代化的关键主体，与中国的政治经济制度、社会结构等存在较大差异，长期在不平等的世界体系下处于边缘位置，习惯依附大国或依赖外部资源投入，自主发展能力有限，加上政治局势动荡、经济结构相对脆弱，因此虽然当下非洲国家自主发展意识与行动增强，但发展前景并不容全然乐观。尽管如此，这些不利因素并不足以抵消中国式现代化和中非共同现代化所承载的新型国际发展秩序和全球发展治理的潜力，其中孕育的新发展知识范式尤为关键。

相较于传统国际发展知识范式，以中非共同现代化为代表的“全球南方”发展知识范式新探索目前已隐约呈现出若干新趋势新特征。其一，坚持发展优先，聚焦发展议题。长期以来，西方发展援助体系以治理为中心，通过附加政治条件来调配资源，加剧了全球发展不均衡，造成严重发展赤字。对此，中非合作及南南合作从发展中国家实际出发，直面最迫切经济发展和减贫需求，使发展回归合作的中心议程。其二，坚持求同存异，谋求多元统一。虽然同为发展中国家，但“全球南方”各国的自然资源禀赋、经济结构、科技水平、社会文化大不相同。1990年南方委员会发布的《南方的挑战》报告就明确提出“今天的南方要比昨天的南方更缺少同质性”。传统西方发展援助致力于完全复制西方单一的现代化模式，难以契合发展中国家的差异性需求，这也是传统西方发展援助有效性始终较低的根源所在。多元性之下有冲突和矛盾，但也为互利合作奠定了基础。从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万隆精神到新南南合作，其核心都是尊重各国发展的差异性，基于平等、团结、共赢开展合作，共同致力于摆脱贫困与不发达状态、建设全球新秩序，实现了多元统一。^①其三，坚持双向互动，共商共建共享。传统的国际发展知识范式以欧美发达国家成熟的现代化模式为唯一基础，通过单向的发展资源和发展经验流动，并以制度化、组织化的形式让受援国被动趋同于西方现代化，从而抑制了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发展主体性。在此范式内，双方是不对等的依附关系。与之不同，中非合作及南南合作没有预先设置任何单一性的模式标准，而是在合作框架下的具体实践中广泛借鉴全球范围内的发展经验，不仅有欧美发达国家的成熟经验，也包括“全球南方”国家自主探索的多样化发展经验、

^① 殷之光：《全球南方与新型全球化》，载《学术前沿》2023年12期，第35~49页。

路径和模式。该范式强调合作方的双向互动，通过在自下而上的共商、共建、共享过程中激发发展主体性意识，培育自我发展能力，构建了一种更加平等的发展合作伙伴关系。

四 结论与思考

面对当下“全球南方”的群体性崛起，回望 70 年前召开的万隆会议仍具有深刻的启示意义。从国际发展合作角度切入可以看出，从 20 世纪五六十年代南方国家之间的政治团结、七八十年代的经济技术合作到 90 年代以来的全球化浪潮，南南合作与西方发达国家主导的国际发展平行且交织，其中南方国家发展主体性的表达和成长是一条始终延续的重要脉络。“全球南方”的兴起是南方国家发展主体性再度复兴的集中表现，特别是相较以往有更坚实的支撑，即新型发展知识范式的孕育。此范式已隐约显现前所未有的影响力，主要得益于坚实的新发展资源基础、多元的新发展经验积累，以及新发展平台机制等要素的有力支撑。中国作为全球最大的南方国家，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取得长足发展，经济水平、综合实力、民生福利超越了以往任何一个发展中国家，弥补了以往南南合作缺乏“火车头”国家、制度性建设，以及务实发展路径参考等方面的诸多缺憾，为“全球南方”注入了强劲动力。同时，中国以中非共同现代化为关键着力点，为“全球南方”现代化合作探索开启了新典范，在实践层面通过中非共商共建共享的新型实践加速新型发展知识范式的兴起与转型。

从今日国际发展合作视角重新审视万隆会议，其历史遗产不仅是冷战背景下南方国家联合自强、反对殖民主义、种族主义和帝国主义的行动，更是开启了南南合作和新发展知识的新篇章。对于“全球南方”发展主体性及发展知识范式转型这一核心线索的探讨，可为系统认识万隆会议及其系列历史遗产提供新的理论视角。沿着此路径，学界仍有系列问题有待深化研究。其一，如何链接南南合作的历史资源与当下“全球南方”的时代内涵？正如本文所提及，“全球南方”尽管近年来成为新热点，但其概念所涵盖的南南合作、发展主体性诉求，以及对更加公正合理、开放共赢的全球新秩序的愿望等要素，从万隆会议起便一直被强调，且需持续探究。这方面在 70 年南南合作历史进程中也积累了正反两方面丰富的实践经验和教训，也产生了不少理

论成果，包括基于拉丁美洲经验提出的依附理论、基于东亚新兴经济体所提出的发展型国家与经济，以及基于中国经验之上所提出的新结构经济学、多元共生体系、平行经验分享^①等概念体系，但如何系统总结在不同历史语境下的南方发展知识传统与系统，提高其内在一致性与共通性，从而形成更加具有普遍意义上的知识建制，仍是当下的挑战。其二，如何处理“全球南方”发展知识范式与传统西方发展知识范式的关系？发展知识作为全球秩序的隐形线索，其范式的兴起及转型对全球秩序有着很强的形塑作用。“全球南方”发展知识范式与传统西方发展知识范式之间有对话交流，也有竞争冲突。目前，后者在发展知识体系里仍占据主导地位，但源于南方国家发展实践、多元化的现代化道路及其所孕育的新型发展知识要素正呈现不断上升的态势。“全球南方”发展知识范式或新发展主义知识范式^②需要在更高层次超越两者差异，通过全球不同区域国别发展研究学者的共同理论创生，不断拓展发展知识的存量空间，挖掘发展进程与发展合作中的多元主体性。其三，如何认识“全球南方”引擎国定位及中国的应对策略？历史上，南南合作向来缺乏足够巨大体量的火车头国家或国际组织的引领。目前，包括中国在内的金砖国家、二十国集团中新兴经济体等是最有能力来承担这些角色的国家。这一方面是对中国等国家综合实力的肯定，但另一方面也对中国等新兴经济体的责任和全球领导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和更大挑战。因此，在继续推进本国现代化进程的同时，中国需更加深度参与全球发展治理，团结印度、巴西、南非等金砖国家和新兴国家共同引领“全球南方”共同现代化进程。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在促进“全球南方”共同现代化的过程中，又进一步推动国内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在促进国内外经济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同时，加速形成国内和国际互利共赢的发展哲学与发展路径。这对进入新发展阶段的中国来说，无疑也是一个重要的研究议题。

（责任编辑：詹世明 责任校对：樊小红）

① 参见林毅夫、蔡昉、李周著：《中国的奇迹：发展战略与经济改革》，格致出版社，1994年版；金应忠：《国际社会的共生论——和平发展时代的国际关系理论》，载《社会科学》，2011年第10期，第12~21页；任晓：《国际关系中的共生理论》，载《中国社会科学报》2024年3月14日；徐秀丽、李小云：《平行经验分享：中国对非援助理论的探索性构建》，第117~135页。

② 李小云、唐丽霞：《新发展主义：可否成为全球南方的理论武器？》，第12~23页。